

● 现当代文学

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

——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一

吴道毅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道毅(1965-),男,湖北来凤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生,中南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要] 新英雄传奇以讴歌工农兵新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历史的传奇式描写。它不仅以艺术的具象展示了不同革命历史阶段战争生活的壮丽图景,而且以历史的聚焦凸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主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话语向民族话语的重大转换,一方面昭示了新英雄传奇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新英雄传奇;现代民族国家;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27-06

—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自身的长期闭关自守与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残酷打击,中国由一个封建帝国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内部没有民主,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1](第291页),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在这种历史情境中,近代中国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继发起了旨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在这些民族、民主革命中,最为中心的主题莫过于建立一个与国际政治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参与世界竞争,寻求民族的现代性发展。梁启超提出的“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2](第11页),便可谓对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刻阐释。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一方面坚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第272页),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一方面把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作为革命的主要动力装置付诸实践。然而,当中国共产党发起新型的革命运动之时,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却“尚无中华民国之实”^[4](第365页),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占领东北三省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更是危机空前,乃至被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一历史处境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并首先完成此前民族、民主革命所遗留的中心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换言之,它“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

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第 352 页)而“第一步”,也就是进行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第 349 页)。

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断发育成长之时,处在战争环境之中,以救亡为己任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便积极对它进行叙事,为它呐喊,以参与革命历史的同构。而当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于中华大地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大规模地对它进行叙事,以此构筑民族自由解放的神话,并为新的国家与新的社会作出合法性证明。

以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为创作重心并追求传奇审美旨趣的新英雄传奇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以《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为开端的新英雄传奇作品,便以迅速的姿态,对处在发育成长中的新中国进行叙事。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直至 80 年代初期,以《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为代表的新英雄传奇,不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历史“记录组织成读者可以识别出来的不同种类的故事”^[5](第 164 页),对其加以“文本化”乃至“经典化”,而且以新中国萌芽生长、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为主线,展开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并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小说创作潮流。

二

1938 年,身为陕甘宁文协主任的周扬大力号召与呼吁解放区作家:“战争变化了中国,而变化得最迅速且最巨大的是邻近战争的地区。那里有无数兵士兄弟们为卫国守土的流血的战斗,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誓死的斗争,有抗日政权的巨人般的出现,而尤其值得在文学上反映的,是敌人的野蛮残暴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所激起的剧烈的变化,他们从落后的,散漫的,屈从的转变到前进的,有组织的,抗争的这个伟大的觉醒的过程。于此可以展示出中国现实的积极面,中华民族力量的储藏量,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雏形。”^[6](第 71 页)应该说,新英雄传奇的诞生及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周扬这一讲话精神的政策导引分不开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境遇中,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以及它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儿女不得不采取正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及其武装力量作殊死搏斗。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伟大的战争史。新中国也正是在新民主主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推动下孕育成形并脱胎而生的。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表现为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话,那么,新英雄传奇就是对于新民主主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艺术再现。它不仅以相当规模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情景,而且以为数众多的作品分别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民主战争、解放战争的时代风云,几乎构成了一部完整而宏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象史。尽管比之当代现实主义战争小说,新英雄传奇对新民主主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艺术再现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诸如采用浪漫传奇的手法描写战争,侧重描写各种游击战争与小规模战争等),但无论如何,它所描写的战争客观上都是促进新中国发育成长的强大动力。因此,从最外在、最直接的层面上看,新英雄传奇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历史风云的生动讲述,展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正义的民族、民主战争以缔造新中国的历史主旋律。

大批新英雄传奇作品通过对抗日游击战争不同历史场景的具象描写,凸显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战胜或消灭日本侵略者,赢得民族解放,从而推动新中国发育成长的伟大历程。如在晋绥边区,吕梁一带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民兵自卫队,按照毛主席“挤敌人”的方针,实行“劳武结合”,组织“变工爆炸”,与日本鬼子及汉奸队伍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最后挤得敌人统治区“中面变成线,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吕梁英雄传》)。在鲁南临、枣铁路沿线,刘洪、王

强等铁道、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铁道游击队，通过“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夜袭临城”、“打岗村”、“拆炮楼”等惊心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战斗，打得鬼子心惊胆寒，最终迫使一整铁甲列车的鬼子向铁道游击队投降（《铁道游击队》）。在广大的冀中地区，既有区委书记许凤、区游击队长李铁领导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展开的激烈遭遇之战（《战斗的青春》）；又有武工队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队与日、伪进行的机智灵活之战（《敌后武工队》）；还有区委书记齐英、八路军排长史更新在小李庄一带领导的艰苦卓绝的生死之战（《烈火金钢》）……这些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艺术描写，既从整体上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风云，又凸显了这样的历史理念：正是全国各地中华儿女奋起抗战及其所取得的一个个胜利，中华民族才逐渐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赢得了民族独立，进而为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根本的先决条件，使之得以孕育成形。

不少新英雄传奇作品则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内民主革命战争历史风云的集中描写，凸现了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解放战争，从而削弱以至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迎接新中国到来的光辉历程。如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大队长郝大成带领红军战士在井冈山地区的四岭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通过“狭谷突围”、“奇袭白云山”、“恶战伏虎岭”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争，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团阀与正规部队的重兵围剿，并找到了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的井冈山道路（《万山红遍》）。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被叛变后的国民党抓进厦门监狱的共产党员李悦、四敏、吴坚、剑平等与狱外党组织密切配合，最后成功地组织了集体大越狱，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小城春秋》）。解放战争之初，由青年指挥员少剑波率领的解放军精锐小分队深入东北莽莽林海雪原，通过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大周旋等传奇式战斗，既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权在广大东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又肃清了该地区长期以来为害人民的社会痼疾——匪患（《林海雪原》）。新中国即将来临的黎明前夜，中共重庆地下党人许云峰、江姐等为迎接共和国的到来，广泛发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与大势已去仍作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最后的生死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红岩》）……这些描写，在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前仆后继的国内解放战争的历史情景的同时，展示了新中国在国内民主战争推动下孕育成长的历史轨迹。

三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7]（第1页）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中国来说，是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使她成为了一个政治实体。历史地看，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在世界竞争中屡屡被动挨打、不能形成现代民族国家，除了政治制度落后、国力贫弱等原因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是民族儿女的不觉醒，特别是他们民族、国家观念十分匮乏，政治觉悟程度极其有限，以致“虽经国耻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8]（第23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华民族儿女终于逐渐觉醒与成长起来，并彻底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对新英雄传奇来说，它不仅着力于对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创造，而且以动态描写的方式展开新英雄人物从蒙昧到觉悟、从落后到先进、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历程，乃至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成长模式”。因此，从较为内在的层面看，新英雄传奇又通过对中华民族儿女觉醒与成长的描写隐喻了新中国的发育成长。

新英雄传奇以具体的新英雄人物为描写对象，普遍展示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思想觉醒的崭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宣传发动下，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召唤中，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不断从落后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民族意识与革命觉悟逐步高涨，纷纷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历史洪流，从而带来了民族与国家历史命运的根本好转。如在《新儿女英雄传》中，尚未觉醒的牛大水虽老实厚道，勤劳肯干，但却胆小怕事，耽于守着“五亩苇子地”过小日子，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充当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七七事变”爆发后，他除了惊慌与恐惧，以及担心自家的收成与活命外，根本不理解整个民族的命运，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责任。真所谓“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7]（第21页）。

然而,经过共产党员黑老蔡的启发教育,牛大水的民族意识很快觉醒,由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再如在《苦菜花》中,生活在胶东王官庄的母亲(仁义嫂)老起等民族儿女们,曾经“传统的象牛马一样的劳动着”,或“象绵羊一样驯服,象豆腐一样任人摆布”,并“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改变的”^[9](第 3 页),但在共产党员姜永泉与上级党组织的启发带动下,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同时觉醒起来,并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铁道游击队》中,面对同胞无辜被日寇残杀,鲁南铁路沿线的铁路、煤矿工人刘洪、王强们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看客”^[10](第 216 页),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铁道游击队对日寇予以坚决还击……这些民族儿女思想的觉醒,不仅标志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而且带来了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的根本转折,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始朝着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迈进。

新英雄传奇还通过新英雄人物具体行为的描写展示了民族儿女不断成长的历程。仍拿牛大水、杨小梅来说,经过“县上受训”,同属文盲的牛、杨二人都识了字,学习了文化,并接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特别是牛大水,在“受训”中丢掉了故土难离的心理包袱,克服了纪律观念淡薄的落后习气。尔后,在农民游击队里,不会带兵打仗的牛大水又在老排长的指导下掌握了作战本领。他相继担任过村农会主任、村长、区委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职务,率领游击队在白洋淀一带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在解放县城一役中,牛大水亲手击毙了日军司令龟板,以及大汉奸何世雄及其走狗张金龙。杨小梅也在民族战争的洗礼中由一个柔弱女子成长为坚强的抗日妇女干部……总之,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们积极地投身于抗战的历史洪流,而革命熔炉与战火的锤炼又使他们不断成长起来,终于成为有胆有识、舍生忘死的新儿女英雄与创建“新社会的柱石”^[11](第 1 页)。

无论是民族儿女的觉醒还是他们的成长,都从国家主体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巨变。对新中国来说,这种巨变不仅是其发育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且构成了新中国发育成长的一个具体缩影或重要侧面。从这个意义上,新英雄传奇对民族儿女觉醒与成长的描写,隐喻了新中国的发育成长。

四

战争为新中国诞生创造了基本途径,民族儿女的觉醒与成长也构成了新中国主体力量的内在转变,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概念的形成,即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社会,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一个有组织的政府。”^[12](第 34 页)对于成长发育中的新中国来说,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广泛人民性、拥有完整主权的新型国家政权(即中央政府),不唯是其成长发育的需要,而且是其屹立于世的最终表征。除了描写战争与民族儿女的觉醒与成长外,新英雄传奇还大力书写了新型人民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孕育成形和发展壮大。虽然,它没有直接描写新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维埃或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但却广泛展开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各种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建设的描写。

新英雄传奇普遍描写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暴中各种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的蓬勃兴起的生动景象。如在《洋铁桶的故事》中,作者专门描述了“老百姓自动组织新政权”的动人场面:一心投靠“皇军”、出卖八路的维持会伪村长被洋铁桶一枪打死,抗日游击队与“老百姓”一起在何家寨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新的区政府,并由“三十几个庄子的代表”约 400 人通过“民主选举”,选举新的区政府干部。在《苦菜花》中,根据上级党组织“把政权夺过来,攥在咱们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的指示,共产党员、区代表姜永泉深入王官庄,与当地农民共产党员一起组织武装暴动,一举推翻了由卖国贼、大地主、大恶霸王唯一把持的水胜乡旧政权,并通过召开群众大会,“产生村政府,选举村干部”——“会写写算算,办事有些办法”,为人老实的原村长老德顺被选为村长,德松、七子、娟子、兰子等农民共产党员分别被选为农会长、副村长、妇救会长和青妇队长,玉秋、大海等革命积极分子分别被选为民兵队长和青救会长……在这些生动的景象中,我们还不难发现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所凸显出来的诸多“新型”品质。如阶级关系上,以劳动人民为其主体,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在政权性质上,人民群众真正做到了当家作

主,等等。这些,无疑开始具有了未来新中国政权的同质同构性。

新英雄传奇还极力展示了新型地方性政权在实现民族解放、维护国家独立上的核心功能。这里以《山呼海啸》为例作些分析。日寇犬养武政郎联队近三千人并纠合数千汉奸队伍,向担任箝制敌任务的八路军昆仑部队主力连与春华山根据地人民发动疯狂攻击,企图占领我大好河山,奴役我人民。然而,由于在以春华山为中心的广大滨海山区——包括春华、东霞、南栖、禄川等各县,普遍建立了强大的抗日民主新政权,以及这些抗日民主新政权奉行的坚决抵抗来犯之敌的对外政策,侵略者的美梦不过是黄粱一现。这种核心功能的发挥凸显了新政权的独立自主性,即新政权所享有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苦菜花》等作品都有类似的描写与展示。

各种新型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暴中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在阶级关系、组织形式与政权性质等方面凸现的与未来的新中国政权同质同构性,特别是它们对国家主权的真正享有,无疑从国体与政体方面标志了新中国“雏形”的诞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英雄传奇对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建设的描写,象征了新中国的发育成长及其诞生。

五

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的叙事并非由新英雄传奇发端,而早在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政治小说就已开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对于“新中国未来”图景的勾画中最早体现了维新派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超前想象。而蔡元培的《新年梦》,则直接表达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要求:清政府作为“冒牌的管帐人”伪造印章,把货物盗卖给外人,终被众人驱逐,体现其统治制度的“老法子”被全部废止,人们按照新的国法办事;列强的海陆军皆被击败,租界被赎回,失地被收复,“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地方,被“统统消灭”。稍后,陈天华的《狮子吼》,还以更为慷慨的语言警醒东亚睡狮(指中国)起来反对“野蛮人”、“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均喻西方列强),且通过对“民权村”的描写展示了建设新中国的种种气象。

然而,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小说中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化作了一时的过眼烟云。“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导入思想革命,鲁迅等民族知识精英们坚持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来改造与振兴中国,并特别强调“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或“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3](第27页),即把改造“国民性”、建立国人的健全人格放在首位。这种启蒙主义话语背面所潜隐的深层次民族情怀或救亡意识,由于其重心落在反封建或“剖析”“国民性”弱点上,它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毕竟是难以等同的——因为后者是对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民族国家或走向新生的民族所进行的历史叙事。

在20世纪文学中,真正而且大规模、大面积展开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是4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兴起,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创作浪潮的各种叙事文学类型——如当代现实主义战争小说、新英雄传奇、叙事诗、戏剧、电影作品等等。这是因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进行及其取得的辉煌胜利,特别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文学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不仅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而且获得了活生生的现实参照。而在“民族化、大众化”、“普及第一”等口号下大量涌现,并深受广大工农兵读者喜爱的新英雄传奇,堪称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最大方面军。它与其他当代叙事文学类型所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不仅表明了时代主题变化对文学话语所发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而且标志了中国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主义话语转向民族自由解放神话的重大转换。就新英雄传奇来说,尽管它的不少作品存在着阶级话语过分挤压民族话语、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情形,未来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有可能对它所描写的革命历史进行“解码”与重新“编码”,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文学与历史的同构关系,并再现了现代中华民族走出内忧外患、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划时代历史,成为使后世之人得以了解这一划时代历史中的重要“文本”类型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它为

现代“史诗”,以此确认它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A].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A].饮冰室合集:第 22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美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6] 周 扬.我们的态度[A].北京大学,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7] 梁启超.新民说[A].饮冰室合集:第 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8] 梁启超.改革起源[A].饮冰室合集:第 6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 冯德英.苦菜花[Z].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
- [10] 鲁 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上[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
- [11] 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A].袁静,等.新儿女英雄传[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12] 徐 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3] 鲁 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上[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何良昊)

Narrative of Modern Nation-State

WU Dao-y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U Dao-yi (1965-),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bstract The new hero legendary is concentrating on singing the praises of the new heroes who ar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while it depicts with legendary methods the histories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war which 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not only opens up the magnificent prospects of war life in each revolutionary periods with a concrete picture of arts, but also proves by focusing history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is sense, it means narrative of modern nation-state. This narrative of modern nation-state reflects the great conversion of new mainstream discourse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from enlightenment discourses to nation discourses. On the one hand, it displays the existing values of new hero legendary as contemporary nar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hero legendary; modern nation-state; narrative